

“补火生土”考辨

林 殷 指导:鲁兆麟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补火生土;丹田;命门;中医理论

中图分类号:R 242

“补火生土”是传统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之一,按相关辞典上的解释,所谓“补火生土”是借五行相生理论,运用壮肾阳的药物,以温补脾气的方法^[1]。问题是,按照传统五行与五脏的配属关系,“火”原指心火,而肾是属“水”的。那么从何时起,“补火生土”之“火”改成肾阳或“命门之火”?这种改变的临床意义何在?对此,笔者谨从古代文献入手,作一梳理。

1 历史的回顾

五行与五脏的配属关系,曾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土和火的配属为例,在古文尚书中,是肺属火而居上,心属土而居中;及至西汉今文经学,则改为心属火,脾属土。这种改变反映了中医学从重形态到重义理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如汉儒郑玄就讲:“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缪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2]。”《黄帝内经》中的藏象学说即

是采取这种五行配属原则。但无论五行与五脏的哪种配属,在儒家经典和早期中医学理论中,均无一行配二藏之说。

一火两名源自运气学说《素问·天元纪大论》^[3]提出“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以满足天行六气的需要,即《素问·六微旨大论》:“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之意。其中,君火为心所主,似无异议。相火所指为何?代有新说,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金代医家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4]中“手厥阴心包经与右肾命门并为相火”说;李东垣《脾胃论》^[5]中“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说;以及元代医家朱丹溪更有专著《相火论》^[3],不仅以常、变分相火,且肝、肾、胆、膀胱、心包络和三焦等脏腑都与之相关。但这些论说似乎均与“补火生土”治则无直接关系。“补火生土”之说究竟源自何时、何处?笔者以为,要弄清这个问题,仍需

林 殷,女,45岁,在读医学博士生,副教授

膀胱的水液来自于小肠,在阳气主要是肾阳的作用下,通过气化过程使水液进入膀胱,膀胱中水液又在其气化作用下,蒸发分布全身或排出体外,气化功能遂成为膀胱的特有功能,故《内经》记载膀胱具有气化功能。上述两种治法正是在这种膀胱功能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利小便即实大便,化气利水,温阳化气利小便治法和膀胱气化功能等的提出,是与未发现膀胱上口的解剖认识有关,亦即从解剖误识中产生的,故今人理解起来困难。也难以用实验方法去观察阐明其实际过程。所幸的是中医并未完全按此理论去择药,相反在对药物作用的临床实践中,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上述理论去解释,以上述治法去归类,亦即先有了临床治疗用药经验,再有理论与治法的,故尽管理论与治法存在问题,却并不影响临床治疗效果。然而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现象,药物作用与治法内容不符的结果,使中医理论不仅难以理解,易使人产生不科学的念头,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中医进一步发展,只能停留在经验这个层面,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论升华,从而不利于中医的发展。

5 小结

从古代医籍记载,可以肯定中医学中的膀胱名称指的就是人体解剖意义上的膀胱脏器。限于历史条件,古人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认识不全,甚或错误之处,并影响到治法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治法名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我们有必要在注重形态学基础上对其加以改进,更好地探索中医医理,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以利中医的现代发展和中药的科学开发。

(收稿日期:2002-09-04)

要从历史事实出发。

2 由心君之火到 鼎釜之火

按公认的说法,“补火生土”的代表方剂是四神丸加白术之类^[7]。四神丸的前身是二神丸,出自宋代医家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9]第二卷“心小肠脾胃病”篇。主治因脾胃虚弱而纳呆,但用补脾胃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病证:“治脾胃虚弱,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验,予授此方,服之欣然能食”。原方中的“二神”是指破故纸和肉豆蔻两味中药,做药时先用大肥枣 49 个、生姜 4 两,切片同煮,枣烂去姜,取枣肉(泥)研为膏,与研成药末的“二神”共杵,做成梧桐子的药丸。在分析此证的病机时,许氏指出,之所以单用补脾胃的药治疗无效,是因为本证的根源是肾气虚弱,不能助脾运化:“此病不可全作脾虚,盖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其观点,许氏举了一个家常生火做饭的例子:“譬如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虽经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十分生动。

此说在唐代王焘《外台秘要》^[7]卷十一治疗消渴方论中即已经有过,王焘说,消渴病的肺热口渴,是因为“肾虚所致”。就象锅里有水,需要柴火烧热,蒸汽上腾,如果盖上锅盖,盖子上就会有水蒸汽;否则,即使锅内有再多的水,锅盖也是干的。这个“火力”,不是指高高在上的心火,而是指腰肾:“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得润也。火力者,则为腰肾强盛也。常须暖将息,其水气即为食气,食气若得暖气,即润上而易消下,亦免干渴也。是故张仲景云,宜服此八味肾气丸,并不食冷物及饮冷水,今亦不复渴,此频得效。”无论王焘还是许叔微,按照传统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意识到人体之火当自下而上,就象灶台中烧水煮饭的薪火一样,才能更好发挥温煦、鼓舞周身气血运行之力。以“鼎釜之火”比喻肾气,似乎更强调它作为生命活动“源动力”的作用,所谓主乎动者为火,已蕴含有与传统“阳虚生内寒”的病机不同的理念。

3 由 鼎釜之火 到 丹田之火

关于脾肾虚弱所致泻泄的病因为何?许叔微等医家没有细说。但我们从宋代稍后另一位医家严用和的著作中,似乎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严用和(约公元 1199~1267 年),南宋医学家,比许叔微晚生半个多世纪。在他所著《济生方》^[9]一书中,也提到类似病证的治疗:“大抵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治之多不效者”,可用“补真丸”治之。在分析其病因时,严氏明确指出,本证是由于性生活过度引

起:“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是至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滯泄。”病机是因真阳虚衰,不能温暖脾土所致:“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因火衰而致病,治疗原则当然是“补火”以生土。所以严氏的“补真丸”比起许叔微的“二神丸”,用药既多且明显偏于温补或温燥,方中有胡芦巴、附子、阳起石、川乌、菟丝子、沉香、肉豆蔻、肉苁蓉、五味子、鹿茸、川巴戟和钟乳粉计 12 味药,研末,再取羊肾两对,兑入花椒、黄酒煮烂,与研成药末的 12 味药共杵,做成梧桐子的药丸,服用时以与研成药末的“二神”共杵,做成梧桐子的药丸。米汤或盐汤送下。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医临床上用“补火生土”治法,实际上起自南宋医家严用和的“补真丸”。当然,严氏本人并未用此字样。

只是严氏“补火生土”之“火”,是否径直指所谓“肾阳”?严氏似乎并不以为然。他谈到“补真丸”的方义时,首先他不同意所谓“补肾不如补脾”的旧说,进而提出补益丹田之火以暖脾土的主张:“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所谓“真火”、“丹田火”(严氏文中还提到“真阳”、“坎火”)与肾阳是否为同义词?如是,则严氏为什么只讲“肾气”如何,而不提肾阳?可见,所谓“真火”、“丹田火”或许另有所指。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命门的代言词或别名。因为唐代已有医家将丹田、肾间动气和命门之气一以贯之了。

唐代医家杨玄操曾将道家炼内丹的鼎炉丹田与肾间动气相提并论:“齐下肾间动气者,丹田也。丹田者,人之根本也。精神之所藏,五气之根元,太子之府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主月水,以生养子息”(《难经集注·卷五·六十六难》)^[9]。而隋唐时期另一位医学家杨上善则明确指出,肾间动气就是命门之气,两者是一回事:“人之命门之气,乃是肾间动气,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性命根……”(《黄帝内经太素·卷第十一·输穴·变输》)^[10]。只是上述两位医家都没有提到命门有“火”的性质,不过,从丹田之鼎炉到“丹田火”仅一步之遥了。是宋代医家许叔微与严用和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4 “丹田之火”到 命门之火

中医学究竟是何时、由哪位医家明确提出“补火生土”用法,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起码到了明代,“补火生土”之说已成共识。如明代医学家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证治类方·泄泻》^[11]中,对“治疗肾泄方”的主治和病机分析时谈到:“下元虚寒,火

不生土，……以致关门不闭，名曰肾泄，亦名脾肾泄”。治疗方剂包括使用两组四神丸、五味子丸（散）和香姜散等。

王肯堂的“四神丸”，实际上二神丸与五味子散的合方，后者也是出自宋代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见于“卷四·脏腑泄滑及诸痢”⁶部分，由五味子、吴茱萸两味药组成，原方标明是治疗“肾泄”。但笔者认为，以药测证，五味子散治疗的病证当是由肝气或肝火偏旺所致的晨泄。与后世所谓“命门火衰”“火不暖土”所致的泄泻，其病机还是有区别的。所谓五更泄（或称晨泄、⁷囊泄、肾泄）的病机，不是“命门火衰”一途，也有因食积、酒积、肝火等引起的，如上面提到的“香姜散”，以生姜、黄连组方，其适应症恐怕不是“命门火衰”，而是食积或肝火所致，清代医家王清任甚至有用膈下逐瘀汤从血瘀论治肾泄者¹³。还有王肯堂《证治准绳》中提到的《澹寮》四神丸，是在“二神丸”基础上，加入木香、茴香或者神曲、麦芽，合成“四神”。其主治恐怕也不单纯是命门火衰。当然，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再如明代的另一位医学家龚廷贤（公元1522～1619年）在所其晚年著作《寿世保元》中，也谈到所谓五更泄的病机之一是命门火衰，从五行学说而论属于“火不生土”，“一人病泄，每至五更辄即利，此肾泄也。用五味子散数服而愈。……此命门火虚，不能生脾土。”治疗原则应为“虚则补其母”，即用仲景八味肾气丸或钱乙六味地黄丸以补命门生化之源：“法当补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补其母，泻即止，食渐进。……全赖命门火为生化之源，滋养之要也。故用八味丸奏效，只用六味丸亦可”（《寿世保元卷三·泄泻》）¹³。清代医家汪绂在《医林纂要卷一·医原·先后天阴阳气血论》中亦有类似议论：“命门元火，夹而中处，如灶恒燃，如薪传炷，……以胃为釜，火炎釜下，乃烹乃煮。是故饮食减少，脾不运化，实当责之命火衰微之故。”可见，明清之后，补命门之火以培补脾土之治则，在中医学已广泛应用了。

5 讨论

综上所述，五行与五脏的配属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总的来讲是以临床实用为指归。中医一火两名现象，始自唐代“补火生土”之说，肇基于宋

代诸医家。以严用和《济生方》所用方剂“补真丸”为早期代表方剂。时至明代，“补火生土”之说已成“共识”，标志为明代医学家王肯堂和龚廷贤等人“治疗肾泄方”中系列方剂及其方解。“补火生土”治法或观念的形成，反映出中医传统理论从心独属火分散到丹田之火，进而到命门亦属火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传统五行学说的一个突破，也是呆板的哲学五行概念过渡到灵活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个标志，使之在切合中医临床实用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步。中医学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根据人体脏腑机能和病理变化的状态，总结出与传统五行五脏配属关系有别而又符合临床处方用药的新规律，丰富了五行间的辩证联系，从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角度来看，应视之为一种历史的进步。

参 考 文 献

1 中医辞典编辑委员会·简明中医辞典·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466

2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四篇下·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9

3 唐·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宋·林亿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367, 389

4 天津科技出版社总纂·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上册）·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4. 26

5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编校·丹溪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107

6 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21, 56

7 唐·王焘·外台秘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317

8 宋·严用和原著·重订严氏济生方·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组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8

9 吴·吕广注·难经集注·明·王九思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144

10 隋·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176

11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741

12 清·王清任原著·医林改错注释·第2版·陕西省中医研究院注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80

13 明·龚廷贤·寿世保元·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175

（收稿日期：2003-01-10）